

敬業樂群與古史新證

吳偉士

近六十餘年，國父孫先生與今總統蔣先生曾經多次向國人提示「群育」的重要性，指出這是救國圖強建立現代化國家的要素。

民國紀元前六年（西曆一九〇六年）八月七日國父在吉隆坡華僑歡迎會中以「合群」為題發表公開演講——人類可借鑑於蜂蟻；否則雖以虎豹之猛，苟不合群，終必為人所擒獲——可以說是國父對「群育」號召的首次紀錄。其後多次演講尤其是闡揚民族主義時「一盤散沙」的警語，更是發人猛省，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今總統蔣先生在中央訓練團發表「認識時代——何謂科學的群家時代」演講，又為推行「群育」提示具體的指導。

對日抗戰八年中，全國軍民慷慨赴義壯烈犧牲的許多史實，充分顯示群育的推行已使國家意識普遍而且深入一般人心，比較多年以前「一盤散沙」的景象大不相同。

民國四十二年，今總統蔣先生發表「民生主義教育兩篇補述」，特別提倡民生主義教育：「是體會國父關於教育的遺教，根據六藝教育的精神，要把智育、德育、體育和群育四者綜合起來，重新衡量我們中國的教育方針。」

蔣總統在說明民生主義教育特點以及各種計劃與設施的配合以後，更鄭重提示：「我們中國社會是在變動過程的中間，沒有一個現成的社會定型可以作學校教育計劃的基準，各級學校不僅要教導學生使他們適應當前的社會，並且要鑄造學生的性格，指導學生的行為，使其適應未來的社會；這未來的社會不是各級學校或各個教師自己應造的模型，而是我們革命建國事業努力追求的目標。」

十餘年來，臺灣社會經濟的發展，顯現一般國民對「分工合作」觀念的認識。在九年制國民教育實施以及大眾傳播工具革新後，隨着教育的普及與知識的成長，這種觀念自將更加普遍而深入各階層以促進社會的演變。

面對這一情勢，教育界似有不勝負荷的困惑，而輿論報紙在幾經等待與忍耐之後也不得不呼籲「學術界革新」（中國時報社論）。

禮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朱熹註釋：「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群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可以說很明白地指出古代六藝教育的主要精神，這和西洋近代各種科學的分科學會按時舉行討論會學術報告年會相互取益的精神實不謀而合。——不幸漢武帝罷黜百家，學術思想錮蔽於一端，六藝教育完全變質，隋唐行科舉帖經，士子所習支離破碎，不識大體，缺少通才。就韓昌黎兩句名言看來，文人無行嫉賢忌能，唐代應已盛行，旋又演成「文人相輕」歪風，宋明以來朋黨邀結，加以八股時文束縛，「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成為風氣，文人錮蔽自私更與日俱增，不僅樂群取益精神完全喪失，即「專心致志以事其業」的文人也寥若晨星。不求甚解，只走捷徑，成為時尚。蔡元培先生所謂「為學當如造金字塔」以及倡導科學方法和「兼容並包」風氣，可說是力圖矯正積弊要求讀書人注意精確和分工合作敬業樂羣，胡適之先生更曾撰「差不多先生

傳」以諷當世，而神州陸沉以後，傅孟真先生自我反省以「懶」一字貶責教育界同人，真令人感觸萬端。

蔡傅胡諸先生相繼作古後，許多事實表現，「兼容並包」「敬業樂群」也跟着「俯身葬」了。中央研究院的「中國通史（上古篇）」計劃更爲一特別突出的顯例。

按美國哈佛大學數年前曾有「東亞通史」二冊行世，嗣旋又約集各國有關學人合作進行一撰述「中國通史」計劃。若干旅美中國學人亦被邀參加。而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方面聞亦有人獨立特行，決心奮力自撰一「中國通史」，其所撰「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分上中下三篇且已於今春由香港中文大學刊行。中央研究院中國通史計劃在這兩大計劃或先或後開始，如今同時進行，自應更加審慎，約集海內外有關學人共襄盛舉。但事實表現却完全背道而馳，不僅海外學人極少與聞，即現在臺灣之錢賓四（穆）先生亦從未被諮詢。

自王國維先生撰古史新證，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必需運用新出土的地下材料以與多年流行的紙上材料相比證，即成爲一最高原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近年來刊行多種田野考古報告及甲骨文字，可說只是將所獲地下公開材料於世，至於比證紙上材料更進而融合貫通如王國維先生之「先王先公考」或「殷周制度論」，甚至如董作賓先生之甲骨文斷代研究，今日南港已無其人。

如若十人所稱：李濟之先生是中國考古學的權威，也就是說認識了解地下材料最深刻的。而在另一方面即就中國古代典籍即紙上材料言，錢賓四（穆）先生實爲當今第一人且爲惟一一人，其所著「先秦諸子繫年」前在商務印書館刊行，即受士林尊重，近年來又多加增改刪補由香港大學重刊，更可見其日新又新不抱殘守缺的精神（中國通史上古篇中如不述及先秦諸子學說將是匪夷所思）。很顯然地：錢李兩先生如各以所長「樂於取益」，則現正進行中的「中國上古史」計劃勢必珠聯璧合，更爲「敬業樂群」樹一新典範，現身說法以作「古史新證」，影響後學，轉移風氣，消除「文人相輕」積習，馨香禱祝之矣。

28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CANBERRA, 6 to 12 JANUARY, 1971

President: PROFESSOR A. L. BASHAM

Secretary-General: DR. R. R. C. DE CRESPIGN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OST OFFICE,
VIA CANBERRA CITY, A.C.T. 2601

20 June 1969

Dear Sir,

I shall be very grateful if you will arrange to publish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on the 28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in the next issue of your distinguished journal. I hope it may be of some interest to your readers.

The 28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will be held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C.T., from 6th to 12th January, 1971. All scholars of the language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Asia are welcome.

Enquirie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28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ost Office,
via CANBERRA CITY. A.C.T. 2601. AUSTRALIA.

Yours faithfully,



(Rafe de Crespigny)
SECRETARY-GENERAL.

本誌頃接第廿八屆「東方學人會議」來函，該會議將於一九七一年一月間在澳洲召開，茲將原函刊登如左：